

图书翻译与文化积累

贺灵

(一)

图书翻译属于语言翻译范畴。而语言翻译是随着民族的形成而产生，随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加深而加强，尤其是史至近现代，语言翻译无处不存在、无时不存在，成为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巨大推动力。无论是我国各民族之间经济的交往与文化交流，还是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与文化交流，始终离不开语言翻译。语言翻译的范围极为广泛，在民族地区，凡广播电视、报刊、服务行业、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科研活动等都涉及语言翻译。从文化传播和文化积累的角度而言，在语言翻译方面，图书翻译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它把各民族或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用特定民族或国家的语言文字记录下来，供本民族人民学习、使用，成为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新疆是多民族地区，且不少民族跨国而居，文化同源，但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在新疆，语言翻译（具体为图书翻译）表现为好几种语言文字的转换形式。首先，主导地位的汉语言文字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之间的互译。其次，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之间的互译。再次，外文与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之间的互译。这是新疆语言文字文化的独特现象，也是多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现。

图书翻译是一项劳动强度较大的再创作活动。翻译人员不仅要具备扎实的语言文字基础，还应具备文史方面的知识；不仅要精通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还要基本掌握相应民族或国家的语言文字。并且语言学理论知识也必不可少。图书翻译是再创作活动。再创作首先要忠实于原著，不能破坏原著的结构、逻辑，不能歪曲原著的基本意义，而且，还要尽量保持原著的语言风格。这样才能达到图书翻译的真正目的，即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真正了解各民族和各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精神。图书翻译也是一个各民族语言之间进行语言特点的移植和整合、重新理顺语法结构以及语言词汇创新的创造性过程，因而不能视为简单劳动。

图书翻译与文化积累之间的关系问题，自始无人论及，这是文化研究方面的一个缺憾。文化积累是一个外延较长的概念。从广义上讲，凡作为文字形式记录并保存下来的读物，均属文化积累的组成部分；从狭义上讲，形成文字的知识性、理论性、科学性读物是文化积累的核心。就性质来讲，文化积累也有一个无形的方面，即精神文化积累。精神文化积累的内容表现为多方面，包括人们思想上形成的法制观念、伦理道德观念、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代代传承和记忆性，对客观知识的记忆和理解，对人文活动的认识以及其他知识性和科学性知识的接受及记忆等等。精神文化的积累一方面靠口头传授，另一方面作为图书收藏促使其积累的作用是最主要的。精神文化的积累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知识性和科学性较强的文化事项，历来都是通过图书接受和积累。新疆由于系多民族地区，各民族文化发展不太平衡，各民族经济的发展程度不同，文化普遍落后是多数少数民族的共同特点，故大量吸收汉族及国外先进文化显得尤为重要。从这个意义而论，图书翻译对少数民族的文化积累是一个无以替代的源泉。目前，随着社会的发展，各民

族交往的深化以及双语、多语教育的加强，各民族之间语言文字的相互学习掌握已成为普遍现象，尤其是各少数民族群众直接阅读汉文或外文读物的能力大大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图书翻译的作用出现了逐步削弱的趋势，图书翻译对少数民族文化积累的阶段性作用似乎告一段落。但是，文化的发展是无止境的，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深层化，图书翻译对其文化积累仍不可小视。

（二）

在促进我区少数民族文化积累方面，新疆人民出版社可谓功不可没。50多年来，本社立足于发展各民族文化这个基点上，优先扶持和发展各少数民族出版事业，在已出版的两万余种读物中，少数民族文种图书占70%左右。据统计，新疆人民出版社成立50年来出版的两万余种读物中，六种文字的翻译读物达6000种左右，占总出书量的30%左右，其中还不包括翻译出版的近千种不同文种的各类中小学教材和数十种翻译性质的期刊。

新疆人民出版社的出版活动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51—1965年，维吾尔文出版翻译图书822种，哈萨克文562种，蒙古文367种，柯尔克孜文实际出书年限为1956—1960年，计35种，锡伯文实际出书年限为1954—1961年，计150种。第二阶段，1966—1976年，维吾尔、哈萨克、蒙古等文种出版各类图书1000余种，其中翻译读物500种以上。但众所周知，这十年期间的图书，根本谈不上什么文化积累，均表现为极“左”思潮的产物。第三阶段，1977—2000年，维吾尔文推出翻译图书1358种，哈萨克文590种，蒙古文367种，柯尔克孜文实际出书年限为1981—2000年，出版32种，锡伯文实际出书年限为1982—2000年，出版52种。在上述两个阶段（除文化大革命阶段），四个文种共推出翻译图书4335种，其中1955—1965年为1936种，1977—2000年为2399种。

新疆人民出版社1951—1965年的翻译图书出版活动，具有很鲜明的时代特色。在此期间出版的1936种翻译图书中90%为政治、哲学和法律书籍，其次是农村科技和医药卫生方面的读物。另外，翻译的千种中小学各文种政治、语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等教材，多数是在1951—1965年间出版发行的。但是，从文化传播和积累的角度讲，这一时期的图书翻译，缺乏狭义上的文化积累特点，除各类教材外，多数翻译读物都有指导性意义，尤其是政治类读物多具有很强的时间性，很多为针对当前形势的材料。自1951年陆续创办的各种维吾尔、哈萨克文期刊，深受农牧区广大群众欢迎，其内容主要也是以汉文翻译的作品为主，包括文学艺术、政治、法律、历史、人物、农村科技、医药卫生等方面。在少数民族文化积累方面，从广义上讲，期刊杂志的作用也是不可小视的。因为，在文化启蒙、科普知识和卫生健康知识的宣传与普及等方面，期刊杂志所起的作用比其他宣传形式无法取代的，并且，这种形式是文化积累的重要方面。

文化积累有其时间性和稳定性特点，就是说文化积累的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二是积累的文化事项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考察，新疆人民出版社1951—1965年的翻译图书，从狭义而言，其文化积累意义并不很大，首先，多数图书时效性特点较明显，长则一二年，短则半年或更短；很多图书均表现为初级读物，文化含量很低，因为低含量文化缺乏稳定性，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步失去意义，就是说为文化更新规律所左右而被淘汰。但是，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本社开始注重文化积累方面的选题，少数民族作者的原创作品及民间文学作品陆续被安排出版。这是本社狭义上文化积累的开始。

自 80 年代初始，新疆人民出版社逐步转变过去的出版方针，加大文学艺术、文化教育、历史、语言文字、地理、辞书等方面图书的出版力度。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字已开始全面安排汉族古典名著系列、外国名著系列、新疆少数民族五套丛书系列以及各类辞书的编译出版。在 10 年时间里，先后推出上千种具有较高文化积累价值的各类图书。据统计，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和锡伯六种文字推出的近 2000 种翻译图书中，60% 左右读物具有较高的文化积累价值，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这期间，各文种先后推出了数十种有关社科类、语言类、自然科学类和综合型工具书等读物，其文化积累价值可谓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

90 年代初，新疆人民出版社继续加强文化积累图书的出版力度，在短短的几年内便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从翻译图书方面讲，自 90 年代中期开始，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逐步下滑的局面。

90 年代中期以后，由于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商品经济规律开始无情地影响出版界，再说读者的兴趣也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旧的出版模式已不适应于市场经济规律，故本社开始面临由于资金的匮乏而文化积累性图书出版难的局面。翻译图书也同样面临很多困难，故少数民族文种也适应市场需求，及时调整出书结构，大大减少翻译品种，加大本民族原创作品及编写读物的出版力度，但文化积累性读物的出版呈现逐年削弱的趋势。这是市场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

文化积累的厚薄可以反映一个国度的文明程度，文化积累较厚的国家和地区，其发达程度也高，所谓贫穷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往往表现为文化积累较薄。故重视文化积累性图书的出版，对提高国民整体素质，推动生产力和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尤其是地处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更应重视这方面的工作。新疆人民出版社数十年来，这方面的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离实际社会要求还相差很远。因为在少数民族地区，各民族发展水平不一，客观条件优劣有别，因此，出版部门为发展各民族文化事业的社会责任更为重大，应引起各方面的重视。